

寇凤凯 著

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巴蜀出版社

寇凤凯 著

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寇凤凯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6. 3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ISBN 978-7-5531-0658-8

I. ①明… II. ①寇… III. ①道教—宗教文化—关系—社会生活—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B958②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981 号

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
MINGDAI DAOJIAO WENHUA YU SHEHUI SHENGHUO

寇凤凯 著

-
- 责任编辑 王群栗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5011398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9.875
字 数 5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31-0658-8
定 价 62.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马克斯·韦伯指出：“一种宗教一旦定了型，也总会对截然不同的阶层的生活方式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① 道教也是如此，在其形成以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帝王将相、官僚士大夫、普通老百姓这些“截然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其各取所需，从中找到满足自己日常生活需要和乐趣的内容。道教神仙信仰和修炼方术，并不是只针对某个特定阶层的社会生活，并不是权贵或修炼之士的专享权利，而是向整个社会生活开放，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世界”的理论是胡塞尔晚年的定论，其内容之一即“当下的生命体验的意义来自一个普遍的境域，这个境域就是生活世界。它是一切经验的历史基础，先于科学给我们描述的自然世界或科学世界”。^② 人们常说，古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中充满迷信。那么，这些迷信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来自于古人的

①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页。

② 张汝伦《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

“生活世界”，是当时生活危机四伏的表现，是古代中国人在“生命体验”中对自然与社会灾难不明白、不理解的结果。当今科学“给我们描述的自然世界或科学世界”，建立在当今“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古人的迷信世界则建立在他们那个时代“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不解决古人“生活世界”的问题，道教研究就缺乏“历史基础”。故把道教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结合起来研究，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值得我们付出心血。

在古代人看来，所谓风俗是指：“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薄厚，俗有淳浇。”自然地理环境之“气”形成“风”，使居住此地的人们习惯成“性”，化为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气不同，便使人们的习俗有了差异。“明王之化”的目标，就是要“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因为“先王伤风俗之不善”，所以才“立礼教以革其弊，制礼乐以和其性，风移俗易而天下正矣”。因此：“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①移风易俗从而使风俗既“雅”且“正”，这是古代“王化”政治生活的大事，风俗经由“上化下”贯穿在老百姓的社会生活中。故东方朔高度赞美汉文帝：“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把“美风俗”作为“帝王所由昌”的前提条件之一。^②张衡《西京赋》也称：“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人承上教以成俗。化

① 《汉魏丛书·刘子新论》卷九《风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85页。

② 《汉书·东方朔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9册第2858、2871页。

俗之本，有与推移。”^① 道教不仅与时俱进，“有与推移”地承担起为“王化”、“上教”、“美风俗”的责任，而且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以神学面貌担负起服务的任务，而这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服务，正是中国古代百姓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迫切需要的。而每当人们处于战云密布、颠沛流离、灾害频繁、种种“人生无常”现象的面前时，生活意义究竟何在？这也是道教需要向当时的百姓们予以说明的，需要用其信仰和方术来解决社会生活意义的问题。

古代农业社会，“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②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怎样搞好栽桑养蚕、耕种五谷，确保丰衣足食，这也是道教所关心的事关人民生活的头等大事。《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养蚕营种经》说：“一切凡夫，养蚕营种五谷，此乃是众生之命。蚕子是紫微官出，十方玉女所爱养之，五谷蚕子是众生之本，人间种养，最为重事。”因为人们凭借“衣食以活身命”，所以养蚕种田是“上上业”，修造功德莫不由此开始。人民欢乐，在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万民致富，也在于唯念种田养蚕。要想蚕丝五谷获得丰收者，就念诵此经，可获福无量。为什么？因为你一心奉道，天神自然维护这样养蚕种田的人，立刻给予回报，使其“日见富贵”，所求之事都能称心如意。至于世间那些不想劳动者，则因此贫穷，要穿没穿的，要吃没吃的。^③ 以神学的语言奉劝人们听从天尊的教诲，辛勤地养蚕种田，不误农时，不投机取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① 《文选》卷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37页。

② 王符《潜夫论·浮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③ 《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养蚕营种经》，三家本《道藏》第6册，第234页。

再加上虔诚地“念诵护法经”，就会得到天神的全力庇护，逐渐致富。可见，道教既鼓励人们勤奋地从事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活动，又对那些“一心奉道”的人，予以勤劳致富的神圣保证。

农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水，水利建设不足，或旱或涝都会影响收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旱涝灾害频发的国家，但生产力低下，水利建设又跟不上，只好靠天吃饭。干旱时求雨是古代农业生产活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关系到收成好坏，进而言之，与百姓能不能填饱肚子休戚相关。在靠天吃饭的古代小农经济社会，天要是不下雨，怎么得了，农民不得不向主管雨水的神灵祈求。向天求雨的活最早由巫承担，“掌群巫之政令”的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求雨。从事“舞雩”者为“掌岁时祓除衅浴”的女巫。^①何以用女巫而不用男巫“舞雩”？盖古人以为干旱是阳气过盛以致阴阳失调造成的，女性属阴，以阴平衡阳，可引得雨水。雩祭与龙相关，有所谓“龙见而雩”之说。^②汉代求雨仪式中土龙是必不可少的角色：春夏秋冬“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③在汉人眼里，“龙与云雨同气，故能感动以类相从”。^④龙在雨水中不可缺少的功能为道教继承。《太上洞玄灵宝八威召龙妙经》卷上有“用金龙一口，碧珠二枚”的“投水筒”仪式，“以龙珠相连，朱书青绹置水中”，

①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二十六《春官宗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册第816页。按：“雩”为求雨的祭神仪式。《论衡·明雩篇》：“《春秋》，鲁大雩，早求雨之祭也。早久不雨，祷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祸矣”；“夫雩，古而有之。故《礼》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礼”。（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34、238页。）

② 《论衡·明雩篇》引《春秋左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38页。

③ 《春秋繁露》卷十六《求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④ 《论衡·乱龙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45、246页。

即所谓投龙简以镇洪灾。又有“八威神策，以召龙王”。卷下描述龙君降下“及时雨”的大功德：正当万民枯竭，“枯死之人，天下三分过半，焦煎欲尽”的危机四伏时刻，龙君携“群龙数千万，负水乘云，弥布天下，普蒙洪注”，“济度天下枯竭，累日之中，水陆普被流润，川谷盈满，浩浩荡荡”。于是“旬月之中，枯死者皆得生苏”。龙君消除天下旱灾，以免生灵涂炭，可谓“龙威功德大，惠泽荷天灵，济活天下人”。而龙君能立此巍巍大功德，正是元始天尊召威神、威鬼等“八威”将其制伏，劝其行善，“皆从正道之心”的结果。^①这显示当时道教如何通过一些仪式驾驭指挥龙王求雨止雨，以利农时。《无上秘要》卷二十四引《洞玄赤书经》称：运用《洞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神秘文字，能使“天灾自消”，五方“星宿复位”。又能召东海、南海、西海、北海、中海的“水帝”调遣龙神平息“洪水之灾”。^②这表明洪灾与天上的星宿错位相关，而道经可以使星宿回复到正常的位置。

求雨仪式，除了召龙王外，还有风伯雨师。《太上洞玄灵宝八威召龙妙经》卷下称颂龙君“收摄雨师，云罗上京。三日三夜，洒渊清静。禾稼丰茂，万民受生。四时和调，咸亨泰宁”。^③《赤松子章历》卷三《天旱章》道士“谨依天师科法”上章说：“四时失度，国境亢旱，禾稼不登”；“旱风烈日，万姓熬然，稼穡焦枯”；“天气早燥，恐百谷失收。拜上，请天官以时降下，

① 《太上洞玄灵宝八威召龙妙经》卷上、下，《道藏》第6册第238、239、240、241页。按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本书乃道书龙王经中之古者”，“系唐以前道流据陆修静旧目补撰之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

② 《无上秘要》卷二十四引《洞玄赤书经》，《道藏》第25册第68-70页。

③ 《太上洞玄灵宝八威召龙妙经》卷下，《道藏》第6册第241页。

润泽流注”；“风伯雨师，亦同升三天，预酬劳苦。愿天曹告下，速使旱魃之鬼，应章消灭”。^①通过祈雨法事，消灭“旱魃鬼”，降下喜雨，润泽庄稼。然而雨水太多，也造成了灾害，于是又有止雨术。同卷《请雨得水过止雨章》上章说：“初阳以来，亢旱无雨，人失农务，禾稼萎枯。臣谨为百姓寒心，请乞披云降雨，洪泽四注。阴气遍降，遂尔不息，霖雨浩衍，百川滂溢，万姓废业，田苗荡没。……上请天曹，止雨移风，风伯雨师依四时八节，无令越错，收云敛翳，三光丽景，当为止雨”。^②先是大旱求雨，结果雨久下不止，造成洪灾，淹没田苗，于是道士又上章请“天曹”及“雨师”止雨。其目的除了祈求农业丰收，最重要的是所谓“助国扶命”，盖粮食收成好坏事关朝廷稳定大局，无粮不稳啊。

《太平御览》卷十一《祈雨》引《抱朴子》说：方士能神祝者，临泉禹步吹气，龙即浮出，长十数丈，复禹步吹之，长数十丈，“须臾而云雨四集”。又引《抱朴子》说：“历阳有彭祖仙室，请雨必得。”另外引《葛仙公传》讲故事：“吴主曾与仙公坐于榭上，望见道间人民请雨土人，累时不得。仙公曰：‘雨可得耳。’即书符着社庙中，日午大雨，尺余水。”^③这些，皆可见出道士参与了当时祈雨活动之一斑，而且效果显著，很有可能这些道士为精通气象知识的高人。葛仙公“书符”引来大雨，由

① 《赤松子章历》卷三《天旱章》，《道藏》第11册第192、193页。

② 《赤松子章历》卷三《请雨得水过止雨章》，《道藏》第11册第193页。

③ 《太平御览》卷十一《天部·祈雨》，中华书局，1960年，第56页。葛仙公（葛玄）书符祈雨故事又见（晋）干宝《搜神记》卷一《葛玄》：“尝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书符着社中。顷刻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此看来，道符也是道士参与祈雨活动的工具之一。20 世纪初在敦煌出土西晋仙师木简符，释文为：“仙师敕令，三天责龙星镇定空炁（气）安。”三天指道教“三清天”，龙星是管雨的，又是百谷之神。该通道符的大意是：“仙师传达敕令，最高神三天责命龙星镇护农事气候安和”。此符出土于“西北干旱地区，很有可能是雩祭求雨活动中道士施法的遗物”。^①以上说明，道士使用各种手段祈雨止雨，其目的就在于风调雨顺以保粮食丰收。

在神仙传中，神仙的力量保佑着凡人的社会经济生活繁荣昌盛。九灵子所著经书，声称其道术可以“倾神灵之心，得百姓之意。田蚕大行，六畜繁孳”。^②运用其道术，不仅能够确保农民田蚕丰收，而且使得畜牧业兴旺。神仙王远住在陈耽家四十余年，使得耽家“六畜繁息，田蚕万倍”。^③神仙出现在哪里，哪里就经济发达，丰衣足食。这真实反映了凡人心中的愿景。总而言之，古代农业生产过程，不仅仅是个单纯的技术活儿，而且还有信仰问题，信仰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力量。老百姓的信仰用仪式表达出来，在生产过程中的若干关键时刻和环节，如果不举行这些仪式，人们心中就没有底，生怕老天爷带来风不调雨不顺的大灾难。道教各种仪式满足了生产者的上述需求。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道教各式各样的经典、五花八门的仪式及法术，针对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产生出来。换言之，道教试图针对老百姓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和

① 王育成《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述论》，《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287—288 页。

② 胡守为《神仙传校释》卷四《九灵子》，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48 页。

③ 胡守为《神仙传校释》卷三《王远》，中华书局，2010 年，第 92 页。

困难，借助于人们心目中各种各样具有相应功能的神通广大的神仙力量，通过神圣的道教经书、上章等祈祷仪式及各种法术，一一及时地加以解决。即使未能真正有效地处理社会生活中的险情，至少也能给予这些遇见困境的人们以心理上的安慰。这就是古代道教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的力所能及的服务，尽管这些服务在今人眼中属于迷信范畴，却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生命体验”的产物。

我指导的寇凤凯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把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具体落脚于明代，根据明代社会阶层的差异及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性，初步探讨了道教文化与明代社会各阶层社会生活的关系。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四章，分别研究了明代道教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双向互动关系，明代道教文化与士人精神生活的关系，明代道教养生学与士人阶层的养生文化生活的关系，明代道教文化在基层民众的信仰生活、岁时习俗及日常生活中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就我的孤陋寡闻，可以说，这是国内外第一篇比较全面研究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关系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也是我近年指导的博士生中自己感到比较满意、比较优秀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尽管文章尚有许多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作为一篇具有开创性精神的博士学位论文，其可圈可点之处还是不少的，这就留给读者去评说吧！不管怎么说，作者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史料占有较为翔实，写作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心血，确实是令人动容的，也就怪不得我充满激情急于要把此书推荐给读者了。

李 刚

2015年10月

目 录

序	李 刚 (1)
绪 论	(1)
一 选题缘起 (研究意义)	(1)
二 研究现状回顾	(4)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23)
第一章 道教文化与明代政治生活	(25)
第一节 道士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27)
一 道教信徒参与礼典的制定	(28)
二 道士参与国家祭祀	(34)
三 道士为国家举行斋醮活动	(41)
四 道士进入官僚体系	(47)
五 道士参与国家的祈雨活动	(65)
第二节 道教俗神进入国家祀典	(81)
一 明代的国家祀典	(81)
二 进入国家祀典的道教俗神	(84)

第三节 明代“清理道教”刍议·····	(106)
一 社会政治背景·····	(109)
二 明太祖的道教观——阴翊王度，暗助王纲·····	(111)
三 皇权的倡导与示范·····	(113)
四 道教内部的“清理”方案·····	(118)
本章结语·····	(145)
第二章 道家道教与明代士大夫的精神生活·····	(147)
第一节 明人崇道的社会文化背景·····	(149)
一 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	(149)
二 科举录取率低，绝大多数士人无缘仕途·····	(151)
三 皇帝崇道、政治黑暗·····	(153)
第二节 以张宇初为中心的交往·····	(154)
一 张宇初的儒学观——消除士人对道教的误解·····	(155)
二 张宇初与各级官吏的社会交往·····	(160)
三 张宇初与儒士的社会交往·····	(163)
第三节 道家道教与明代官僚的精神生活·····	(168)
一 杨士奇与道家道教·····	(172)
二 赵贞吉的道教情结·····	(178)
三 寻真吊古——道教文化与王士性的旅游生活·····	(193)
四 王思任的道教文化观及其旅游生活·····	(209)
第四节 道家道教与明代落第士人的精神生活·····	(223)
一 归有光与道家道教·····	(225)
二 宋懋澄与道家道教·····	(243)
三 文征明与道家道教·····	(253)
四 谢榛与道家道教·····	(268)

五 道家道教与明代山人	(286)
本章结语	(296)
第三章 道教养生文化与士人的养生生活	(298)
第一节 明人多高寿的现象	(299)
第二节 明代道教养生学概述	(301)
一 张宇初的道教养生学思想——养气炼神	(301)
二 朱权与道教养生学	(307)
三 冷谦与道教养生学	(313)
四 高濂的道教养生学思想	(315)
五 内丹术的简约化与实用化	(327)
六 明代道教养生学的特点	(334)
第三节 明代士人的养生需求与实践	(335)
一 明代士人投身到养生学的研究与创作中	(336)
二 明人的养生实践	(367)
三 明代外丹烧炼的兴盛	(388)
本章结语	(408)
第四章 道教文化与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	(410)
第一节 道教文化与明代岁时习俗	(411)
一 道教符咒文化与明代岁时习俗中的帖符习俗	(414)
二 道教养生文化与明代岁时习俗中的养生保健习俗	(420)
三 道教养生文化与明代岁时习俗中的健身（或体育） 文化	(426)
四 道教信仰文化与明代岁时习俗中的神灵崇拜	(436)
五 道教神灵信仰与明代岁时节日中的经济活动	(455)

第二节 道教俗神与民众的信仰生活	(466)
一 城隍信仰与民众的信仰生活	(467)
二 灵官信仰与民众的社会生活	(471)
三 东岳信仰与民众的信仰生活	(483)
四 碧霞元君信仰与民众的信仰习俗	(486)
五 吕洞宾信仰与民众的信仰生活	(493)
六 关帝信仰与民众的信仰生活	(498)
七 文昌信仰与民众的信仰生活	(505)
第三节 道教法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512)
一 道教斋醮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515)
二 符咒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523)
三 道教医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537)
四 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扶乩术	(543)
五 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占验术、预测学	(562)
六 幻术或魔术——娱乐表演	(566)
本章结语	(573)
结 语	(575)
参考文献	(588)
后 记	(610)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研究意义）

本书拟从道教文化的视角来考察明代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社会文化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简而言之，人们所进行的一切社会活动就是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物质）生活，文化（精神）生活等。它们彼此不是孤立的，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是彼此联系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甚至是相互转化的。^① 学界对明代社会生活的关注，往往不注重从宗教的角度入手，尤其是忽视或轻视明代社会生活中的道教文化之影响。本书选择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作为考察对象，重点考察道教文化与明代祭祀礼仪、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

道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同陈樱宁所说：“历代以来道教界尽管受尽了儒家的

^① 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论丛》第一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排斥和外界的讥笑，而道教自己半入世、半出世的作风，竟立于不败之地，其原因何在？就是它的教理教义深入人心，遍及社会各阶层，适合群众所需要之故。”^①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因其思想构成的复杂性，又具有包罗万象的特点。因此，深入研究道教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助于揭示中国文化深层内涵，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研究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有助于揭示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有助于当代文化建设，这是本书研究的意义所在。而从总体上对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作深入研究目前还很不够，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此，笔者拾遗补阙，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有明一代，道教科仪对国家祭祀礼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道士不仅参与了国家礼典的制定，而且直接参与祭祀典礼。建国伊始，明太祖就设立神乐观，“备乐以享上下神祇”。神乐观各职皆由道士充任，职掌乐舞，以备朝廷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这些道士隶属于太常寺，与道录司不相统属。与此同时，道教俗神大量出现在地方的祠祀活动中，对民间的祭祀活动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尤其是以祈雨仪式为代表的道教科仪，在以农为本的明代社会，深刻地影响了国家、地方的社会生活。明代的国家祭祀礼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道教科仪的影响，以及道士参与国家祭祀礼制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有多大？道教俗神是如何与地方祠祀相结合，道教的祈雨仪式又是如何影响国家、地方的社会生活的？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目前，我们对于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有所认识，

① 陈樱宁著《道教与养生》，华文出版社，1989年，第81页。